

铁梅支队

孙有全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孙永泉，1917年生，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大营子镇人。1932年1月参加抗日义勇军，任战士。参加收复大孤山、龙王庙的战役。反对日寇第一次大“讨伐”，参加了保卫龙王庙战役和红花岭战役。反对第二次大“讨伐”，参加凤城南红旗战役。骆驼岭（南红旗附近）战斗部队被打散，1934年11月流亡到北平。1935年2月考入东北中学读书。参加了反对“何梅协定”，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和“一二·九”等学生运动。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入党。1939年分配到129师新八旅（先遣纵队）工作。在冀南三分区坚持平原游击战、地道战。曾任旅作战参谋和23团参谋长。曾参加百团大战和讨伐叛军石友三、庞炳勋诸战役。1945年参加上党战役和邯郸（平汉）战役。回东北后任铁梅支队一团（辽南独立一师四团）政委，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二师五团团长。参加了配合四保临江的战役，1947年夏、秋和冬季攻势战役。1948年参加辽沈大决战，1949年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以后曾任二一四师政治部主任，南京军事学院哲学教员，基本系政治教研室主任。1959年10月任通信兵重庆雷达专科学校政委。1964年4月给学员讲课时引用《人民日报》陈浚文章的“一分为二，二又合为一”的论点，在批判杨献珍时发表了“合二而一”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意见，受到了一年多的批判和斗争。接着文化大革命又遭受“四人帮”迫害，定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关了三年牛棚（1966—1969），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三年（1970—1973）。1973

年落实政策，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分配任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3月改任顾问。直到1979年9月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平反了，才最后平反了冤案。1985年离休。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回到了东北

一 啊！长城	(8)
二 回到了东北	(15)
三 高举战旗	(26)

第二章 剿 匪

四 降伏两“虎”	(32)
五 一斗“盖不客气”	(46)

第三章 坚持老平顶斗争 49 天

六 两手对两手	(63)
七 鏖战析木城	(70)
八 东诱敌人钻山沟	(85)
九 二斗“盖不客气”	(94)
十 血战大河南	(102)
十一 夜袭沙里寨	(108)
十二 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	(118)

第四章 转 移

- 十三 撤离老平顶 (129)
- 十四 “岗边”修整 (142)

第五章 四出关东州

- 十五 于得水 (155)
- 十六 奇兵战驼山 (170)
- 十七 牵“虎”记 (178)
- 十八 远袭万家岭 (186)
- 十九 陈屯激战 (194)
- 二十 黎明前的黑暗 (204)
- 二十一 李力和他的敌后武工队 (212)
- 二十二 反 攻 (223)
- 二十三 剿 匪 (234)

第六章 秋、冬季攻势

- 二十四 五克大石桥 (246)
- 二十五 三打汤岗子 (256)

第七章 辽沈战役

- 二十六 险战卡力马 (267)
- 二十七 半拉门斗敌骑 (277)
- 二十八 致命的一击 (286)
- 二十九 顽强的“老八路” (295)
- 三十 扫荡残敌 (304)

尾 声.....	(312)
附录：我所知道的邓铁梅.....	(315)
我所知道的苗可秀.....	(370)

引 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在风城县城第三小学（崇正小学）五年级读书。9月19日上午课间操时，我看到了很多日本兵从破坏了的城墙角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我们还以为是军事演习（不平等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南满驻军，过去经常演习），纷纷围上去看热闹。中午放学时在路上看到日本兵押着已经缴了枪的中国败兵在街上走着，县衙门口站岗的也由过去穿黑制服的警察换上横端三八大盖枪的日本兵。日本兵乘着摩托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行人都慌忙躲避。饭庄、商店都上了铺板。这一切我都弄不明白，我急急忙忙赶到我十叔家，向他发出一连串问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下午只有一二十个住校的学生，在校长办公室围着蒋秉黎校长。老校长正在念他的文章，题目叫《哭学生者言》，大意是说我们已经亡国了，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华民族每一个儿女都要站起来反抗日本鬼子，都要打日本鬼子，不要当顺民，更不要做汉奸，要自强救国。

接着蒋校长又讲了昨天晚上日本军队进攻沈阳北大营占领了沈阳，今天上午驻风城的中国军队，以姜全我团长为首

的全面向日本人缴械投降了，日本人一枪未放轻易占领了县城，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亡国了，原来爬城墙的日本兵不是演习，是亡我国家、灭我种族，被奴役的屈辱生活将临头了。

亡国了，对我幼小心灵震动太大了，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当了亡国奴、一切都完了。我们师生非常悲痛、义愤填膺，我们一起高唱“《满江红》”。

正在我们用歌声抒发心中苦闷时，一个汉奸带着一个日本二等兵，腰上挂着一把刺刀，旁若无人地进了我们的学校，态度蛮横地命令蒋秉黎校长把国旗从旗杆上降下来，教室里挂的孙中山像、中国地图等都撕下来烧毁。并规定中国的地理课、历史课都不准再讲，国歌也不准再唱。我们马上就体味到了亡国奴的屈辱和悲惨。

要反抗，打日本，救中国。到底怎样反抗，如何打日本？才能救中国，我是一筹莫展。我苦闷、我彷徨。有时把希望寄托在张学良将军身上，盼望他能带着军队从关内打回来，带领我们一块打鬼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陷，东北三千万同胞处于日寇铁蹄之下。

正在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1931年12月26日深夜，邓铁梅率领抗日义勇军攻进城来打响了向日寇宣战第一枪。

邓铁梅原是凤城县的公安局长，有一身民族正气，很爱国。据说1926年日本人在青城县违约越界开采铅矿，是由他处理的，他下令中国的车辆不给日本人运输矿石，狠狠地整了日本人一顿。日本人再也不敢越界开矿了。人民对此事很开心，对他很钦佩，说他骨头硬。我对他很崇拜。觉得他有

中国人的骨气。听说他在我的家乡大营子小汤沟一带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烽火，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并派人四处宣传，散发《抗日救国宣言》。布告上写道：“山河易色国家多故，生死存亡，迫在眉睫”“我自卫军积极联合救国同志，养精蓄锐，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歼灭暴日，铲除傀儡……”。《宣言》历数日寇暴行、痛斥汉奸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丑行，号召人民同仇敌忾起来抗日，一时间城乡人民争相传诵，八方群众云集响应。它像那漫漫的长夜中突然亮起一盏明灯，使正在彷徨犹豫的群众心头明亮。它又像寒夜火种，唤起人们的爱国热忱。我热血沸腾，相信他能领导我们抗日救国，于是我不再等待了，决心回到乡下去，跟着邓铁梅打鬼子救中国。

我是在1932年过春节之后，到大营子义勇军司令部要求参加部队打鬼子，开始时他们不想要我，嫌我年龄太小（14岁）怎么说都不行，我悲伤地哭开了。正好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三十八、九的中年汉子，身材不高，很精干，两只眼睛深邃且有精神，身穿酱色衣衫，打一副白色绑腿，脚蹬一双青色散口布鞋，负责接待人员说，你问邓司令同意不同意？我顿时明白了，他，就是名震辽南的抗日英雄邓铁梅，此时此刻，我忘记了害怕，上前一步说：“邓司令，我要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你看行吗”？

他一边端详我，一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要你，打鬼子，救中国，这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小家人、有志气，一定要你”。他马上叫人发给我一套军装。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抗日义勇军战士。

开始时我当侦察员，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收复了庄河县

城和大孤山镇（两地政权都投降日本人），攻克了龙王庙、打垮了伪军李寿山的大同队，在沙里寨打掉了敌人飞机一架，在大卡巴岭消灭伪军一个骑兵中队，俘虏人60人。缴获战马60余匹。义勇军以大营子（尖山窑）为大本营，在邓铁梅司令指挥下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展，在不到10个月时间里，胜利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队伍迅速发展到万余人，根据地扩展到安东（东沟县）、凤城、岫岩三县交界，方圆百余里地区一时成为有名的“辽南三角抗区”。这一系列的胜利对我鼓舞很大，认为可以打败鬼子，不当亡国奴了。但是，好景不长，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9月，鬼子对义勇军连续进行三次大“讨伐”，一次比一次兵力大，一次比一次残酷。在偏远的大山区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到牲畜和粮食就抢。一刹时，火光冲天，尸横遍野。实行并村集屯，制造了广大无人区。在一些大的村镇安据点，修碉堡，修公路。点线联系起来，设立警察署，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实行白色恐怖，以此，切断人民和义勇军的联系，把义勇军孤立起来。

敌人第一次大“讨伐”之后，义勇军的大部队就无法坚持活动。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33年1月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义勇军自办的军官学校）因年纪小不能带兵，分配在警卫第三中队当通信员。我们中队有五六十人，分散在队长胥世兴的家乡凤城县龙王庙厢白旗一带活动。环境险恶，斗争异常残酷，几乎每天都要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经常吃不上饭，大多数时间是在山上露营，冬天穿夏衣。每天都要行军转移，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点。敌人的办法，确实毒辣，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群众的支持。失去了这个支持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寸步难行。

1933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中队袭击一个伪村公所，一夜来回走了100多里路。天亮前，转移到凤城县南红旗骆驼岭附近的山上隐蔽休息。部队很疲劳，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岗哨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中午时敌人摸上山来正好遇上一个战士起来解手，他一看敌人摸上来了，立即投出一个手榴弹，并对敌人射击，一下子把同志们从梦中警醒。这时，敌人已扑到跟前，战士爬起来就和敌人拼刺刀，一口气把敌人打了下去。枪响了以后，龙王庙、蓝旗和南红旗的敌人都向这里集中。下午三、四点钟时战斗最激烈，敌人的包围圈还未合拢前队长命令我掩护一部分轻伤员先转移。就这样我和部分伤员先突围出来。中队被敌人完全包围，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天黑后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大部分伤亡，突围出来的也跑散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只有先回家养伤养好了再说，好在他们都能自己走，离家都不很远，便各自走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在山上隐蔽，夜间下山找吃的，打探消息找队伍群众都告诉我，“不行了，你们的队伍，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都散了，你也快逃命吧！鬼子天天在这附近搜山，太危险啊！”群众对我的关心，我很感动。孤零零一个人，就如大雁离群，没有了队伍，我就失去了一切。白天在山上隐蔽，只有晚间摸下山吃饱了走一段路，逐渐向我家乡转移。两年来的战斗生活，使我朦胧地感觉到：光靠义勇军是打不败鬼子的，要打败鬼子得另想办法才行。我怀疑了，不想再找义勇军了。倒不是生死问题，我已经下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贡献我的一切，直至生命。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先逃进关里，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再想办法。但是进关又是谈何容易，没有路费走不成，没有伪满洲人的良民

证，在敌占区是寸步难行，没有伪满州国的旅行证过不了山海关。虽然如此，在我看来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救中国，甚至要想活下去，进关是惟一的出路。当我和家庭联系上之后，我就一边到处躲藏，一边做进关的准备工作，最难搞的就是两证（良民证和旅行证）。当我搞到两证以后，我父亲把他赖以养家糊口的惟一耕牛卖了26元钱给我做路费。我于1934年10月逃到了山海关。这时长城一线是中国和伪满州国的国界，山海关已被日军占领，但山海关主权仍然属于中国，车站上和一些机关学校仍然挂中国的国旗。蒋介石和日本签订的条约规定，长城一线不准驻中国军队。冀东22个县划为非武装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不许驻中国军队，只能驻警察和保安部队，以维持社会秩序。奇怪的是日本倒可以在长城一线驻军，山海关就有日本军队。蒋介石和国民党就是这样断送国土的。到了山海关，我因为有两个证件（良民证和旅行证），再加上年纪小，总算过了关。出了车站，就算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我又算是中国人了。我欣喜若狂，总算逃离了虎口。我赶快走到国旗下面，向国旗鞠了一躬，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憋了几个月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心理重压解除了，思想一下子放松了，真像小鸟逃出了鸟笼又得了自由一样。我对我的新生感到无限的幸福。我真想在这里笑上几天，但是不行，这里虽然是中国的领土，又有中国的主权，但它却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不是久留之地。在离开之前，我决定先到天下第一关的城上去再最后望一次我的家乡。我登上城墙向北方远处望去，那里是我的可爱的家乡。想到这里，鼻子一酸，凄然泪下。默默地向遥远的北方鞠了三鞠躬。可爱的家乡啊！爹娘啊！告别了，再见吧！又向长城一鞠躬。长

城，伟大的长城！你的存在，谱写了我们祖先为我们民族生存而战斗的历史；你的存在，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这就是反抗精神，不屈服精神。你的存在，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它能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轻易灭亡的。我们要继承祖先的遗志，用我们的血和肉筑就新的长城。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长城啊！再见吧！山海关，再见吧！我默念着它的名字。投入到逃难、流亡的人流中去……

第一章 回到了东北

一 啊！长城

战马扬起四蹄，以每天 200 华里的速度，直奔长城。1945 年 11 月 20 日，我从邯郸出发、经曲周、南宫、河间、过香河、平谷等地，于 11 月 27 日上午到达将军关下。到了关下，巍峨雄伟的长城矗立在我的眼前，披着皑皑白雪，显得格外壮观。看到古老的长城，我的心情就激动起来，思绪万千。“打回老家去收复一切失地”是我多年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浴血战斗了 14 年，为它流汗、流泪、也流过血。

我高兴、自豪、骄傲，我爬上了城头，拔出腰中短枪，向空中鸣放了三响，来庆祝我踏在家乡土地上的第一步。

我扒开覆盖在城头上的积雪，寻找当年千万个流亡者的足迹，虽然白雪遮掩了历史尘埃，却掩饰不了留在我心中的耻辱和痛苦。从 1934 年逃出山海关算起，到日本鬼子投降为止，这中间变化多大啊！13 年前，我参加义勇军，打鬼子，仅是一个不愿当亡国奴、一个爱国青年学生所为。13 年后的今天当我二次来到长城脚下时，我已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文武兼备的八路军指挥员。肩负历史重任，我恨不得战马

飞起来。一下到目的地。“山海关，再见吧！”我心里这样想的，不由自主地嘴里也喊出声来，警卫员在旁边楞了以为我发了神经病，大声说：“首长，这是将军关，不是山海关。”我笑了笑：“啊，我们是应该从山海关走！可惜迟了一步。”是啊，我们为什么没有从山海关走呢？当我到达香河县委干部转运站时，县委的同志告诉我：“山海关已经于11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大炮还在山海关附近响呢！不仅山海关不能走了，就连冷口、喜峰口也不安全，只有将军关这条路安全一些，你们只得转道将军关走承德这条路了。”

山海关附近隆隆的炮声，像出征的战鼓、催促我扬鞭跃马踏上征途。随着“踏、踏”的马蹄声，把我的思绪又引到抗战胜利后近几个月经历的回顾。

抗战胜利了，我当时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三团任参谋长。新八旅也称冀南第三军分区，管辖邯郸、曲周、永年、鸡泽、南和广平等县。整个抗战时期，我都在这一地区作坚持游击战争。1945年7月份，我们团在广平和馆陶之间的贾庄、和尚寨打了一仗，歼灭鬼子一个大队、毙伤300多人，俘虏30多人。这是抗战以来，我们团消灭鬼子最多的一次，也是我们团打鬼子最后一仗。这一仗打了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

我丢掉家乡14年了，14年来我天天都盼望这一天到来，我十分清楚这14年是多么难熬，花了多么大的代价。

在高兴和欢乐之余，我们就自然地议论起胜利之后的问题。团长陈仲明、山东历城人，“七七事变”前在北平读高中。政委赖达元、副团长王俊、总支书记曹熙康，都是红军时代的干部，都是南方人。政治处主任高京，是北京地区的人，大

学生，是从延安马列学院来的。我们见面就谈，吃饭时谈的更热烈，所议论问题，集中起来主要两个，一个是我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大家觉得不行，蒋介石和国民党是不会干的，我们要是硬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的联合就要破裂，就要打内战，所以不能马上搞社会主义。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要成立联合政府要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建设成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会不会干呢？大家都很耽心。由此就引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共的联合会不会破裂？会不会打起新的内战，这个问题议论的最多，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是坚决反对内战的，我们国家遭受战争涂炭的时间太久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的屠杀和镇压军阀混战，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屠杀人民的10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的14年对华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太深重了。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摧残，人民迫切的需要休养生息，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建国，我们党是诚心诚意地主张和平的。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建设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祖国的强盛，当大家议论到这里时，心头马上蒙上了一层阴云，蒋介石能不反共吗？

我们的耽心并不是多余的，抗战胜利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是非常暂短的，我们的和平建国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蒋介石于8月11日以后发布的许多反动命令。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命令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也就是他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伪进攻。第二道命令就是命令一切各色各样伪军、汉奸“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听

到了蒋介石这两道反动命令，亮出了他挑起内战的险恶意图，他又举起屠刀，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大家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和平建国，不是安居乐业，而是内战。他命令阎锡山调动由军长史泽波率领十九军督导第六、第二纵队和保安第五第九团等部队于8月中下旬侵入上党解放区。占领了解放区内的长治、屯留、壶关、长子、洛城等五座县城。没想到蒋介石来得这么快，日本鬼子正式投降还没有签字，他进攻解放区的炮声就打响了。既然蒋介石把内战强加给我们，我们当然要保卫和平，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做到“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打鬼子时阎锡山跑到陕西躲起来，蒋介石上了峨嵋山，专搞反共磨擦。抗战胜利了，就下山抢夺胜利果实，这太不讲道理了，气的全军将士无不义愤填膺。磨拳擦掌。为粉碎阎锡山拱进上党解放区的猪嘴巴，从冀南抽调五个团组成冀南支队，进军上党参加作战。由杜义德同志任支队长、孔庆德同志为副支队长、刘明辉同志为政委。我们二十三团是其中一个团，正在部队集结的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中央决定东北籍干部调回东北工作。”这个消息对我真是一个好消息，打回老家去是我多年的愿望，可是马上又要打仗，内心又矛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向前，决心推迟归期，等打完仗再走。1945年8月下旬就开始向上党地区进军。9月7日冀南支队就在河北省的涉县东阳关一带集结完毕。有名的上党战役从9月10日开始打响的。战役的第一阶段，我们冀南支队打潞城、太行军区部队打壶关、太岳军区部队打屯留、长子。这是先扫清长治外围。我们冀南支队，9月10日就把潞城包围起来，我们团担任主攻。我们团有丰富的攻城战斗和村落战斗经验。善于巷战，这是